

摆正“四项基本原则” 和“双百”方针的关系

李 蕤

党的“四项基本原则”，是立国之本和建国之本。它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四条擎天大柱，是我们考虑一切方针、政策的出发点。它的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因此，在宪法里，党章里，都明文规定，任何党员、公民，都必须信守不渝，不容有任何怀疑和动摇。

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“双百方针”，是党根据四项基本原则制定的发展科学、文化的方针。这个方针，一是根据科学、文艺本身的规律制定的，关于这一点，列宁在《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》一文中，作了最详尽的阐述，他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学是“最自由的文学”。二是根据阶级斗争情况的变化、现实生活的变化提出来的，从我国来说，是在大规模的、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，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下提出来的。“双百”方针的目的，十分清楚，是通过创作的自由竞赛，理论的百家争鸣，发展扩大马克思主义的阵地，使马克思主义在战斗的风雨中得到更大的发展。

因此，两者之间的关系，清清楚楚，第一，双百方针当然要受“四项基本原则”的制约，不能凌驾于“四项基本原则”之上，更不能和“四项基本原则”相对立，攻击“四项基本原则”；第二，“双百”方针贯彻得越好，四项基本原则的威力越能得到体现，两者是“相辅相成”的辩证关系。实践证明，只要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正确，科学、文艺事业便得到健康的发展，获得正常的活跃与繁荣，反之，就出现相反的结果。

不容讳言，“双百”方针提出不久，便遇到“左”的干扰与破坏。1957年的“反右”斗争扩大化，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的认识问题作为敌我矛盾处理，打击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，挫伤了“鸣”和“放”的积极性，“双百”方针成为虚话；不仅给知识分子带来从政治到生活到精神的折磨，更重要的是出现了“万马齐喑”的局面，若大的国家，成了“无声”的国家，文学上的《瞒和骗》的苗头开始蔓延滋长，它给整个党和国家的损失是巨大的。特别发展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由于“四人帮”的篡党夺权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，极左思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。这十年浩劫中，“双百”方针不仅连影子也看不见，连这口号本身也成为有罪的名词。关于这一切，我们已经批判了将近十年，在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党以回天之力，进行了一系列的“拨乱反正”工作，纠正了根深蒂固的“左”的路线，批判了“左”的思想流毒，把我们社会主义祖国，又匡正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。从文艺战线来说，“四人帮”强加在整个文艺战线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被彻底推翻了；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由于“左”的流毒所作的错误结论（如所谓“黑八论等等）也得到了纠正；一切冤假错案得到平反，这一切，彻底解除了文艺工作者的精神枷锁。1979年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四次文代大会上的祝词，正确地、全面地系统地阐释了党在新时期的文艺方针，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工作成绩，对于我们的文艺队伍，作了热情的肯定，对于文

艺工作者的创作自由和工作自由，提供了最大的保障，为了避免过去的把文艺和政治关系理解过于管狭的缺点，不再提“文艺为政治服务”的口号，只提“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口号；为了避免“横加干涉”的缺点，提出作家写什么以及怎么写，让作者在创作实践中自行解决；为了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重演，决定任何一级地方组织，不能轻率地把一篇作品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，把作者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（即使有个别这样的情况，也要经中央批准）。特别重要的，是在创作的题材上，描写人物的问题上，艺术风格流派上，给作家以无限广阔的自由。从题材说，上下几千年，古人和今人，都可写；从描写对象说，从英雄人物的业绩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都可以写；从风格说，不论是雄浑的或纤细的，不论是明快或幽默的，都兼收并蓄；从社会效果说，能够教育人鼓舞人精神奋发的固然欢迎，即使是给人娱乐休息、使人提高美学趣味的，也不排斥；对于中外文学遗产，只要有利于人民的，都加以吸收和借鉴；批评方面，也实行三不主义，提倡摆事实，讲道理，以理服人，既允许批评，也允许反批评。近十年文艺之所以空前活跃，空前繁荣，新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与党的正确方针是分不开的。

然而，不能讳言，这中间又出现了来自右的干扰和破坏，那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。他们曲解“双百”方针，把“双百”方针和“四项基本原则”对立起来，他们或者把“双百”方针夸大为党的“唯一方针”，把“双百”方针凌驾于“四项基本原则”之上；或者把二者说成水火不相容，胡说“四项基本原则”是束缚“创作自由”的“框框”，所谓不“突破”它便不能贯彻“双百”方针。最突出的代表是刘宾雁，他明目张胆地攻击四项基本原则，认为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“战略性错误”。其实，在他之前，早已有人这样提过，受过警告。1986年，中宣部长到上海时，文艺界便有那么几个人公开要求党放弃四项基本原则。这些人，站在幸灾乐祸的立场上，死死抓住党曾经犯过（现在已经改正）的错误，无限夸大，利用社会上的“逆反心理”，推波助澜，制造舆论，似乎谁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谁就代表“僵化”、“保守”，谁敢大胆攻击四项原则，便是“思想解放”、“时代战士”，把“四项基本原则”说成“冷风”、“寒潮”，“又要收了”，“又要文化大革命了”等等。用这种办法，欺骗一些比较天真的年青人。邓小平同志早就对这些论点进行过严厉的批评，他说：“把解放思想看成是‘放’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看成是‘收’，是完全错误的。”

当然，一口吞掉“四项基本原则”，毕竟太露骨也太困难了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，更多采取的是“分进合击”的战术，集中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。七、八年来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，对于削弱和摆脱党的领导，真可以说是费尽心机。什么“无为而治”呀，“放任自流就是上策”；什么“人民性大于党性”等，把人民性和党性对立起来，用人民性“来压党性”。这些人自封是代表人民的，理所当然要凌驾于党之上，可以批评党，骂党，你如果对他批评，就诬之为不“民主”，侵犯了“人的尊严”。再就是你们不懂“艺术的特殊规律”呀，你没资格领导。更得手的武器，就是死死抓住你犯过“左”的错误，不管你是否已经改正，一股劲的反“左”，反“左”，再反“左”，你过去的统统是“左”，今天的仍然是“左”，最后，连左字上的括号也反掉了，革命左派也作为极左反掉，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，纠“左”最后成为“纠正马克思主义”，而谁要批评，就是“保守”“僵化”。这种手法，鲁迅早已指出过，是以“透底”作为“彻底”的掉包。然而，小平同志一次又一次的警钟，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警惕，1985年1月的全国四次作协会议，反对、抵制精神污染被否定了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取消，连“批评”二字也嫌刺眼，要改为“评论”。认为这样，作家才有“绝对的自由”、“彻底解放”，甚至有人高呼“这是文艺界的遵义会议”！影响所及，各地都“踏开党委闹自由”，造成1936年的思想大混乱。难

道这是社会主义的“双百”方针吗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“双百”方针吗？否！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所谓“双百方针”，亿万人民是不能接受的，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是坚决反对的。

“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”，这是历史实践证明的真理。我们今天搞开放、改革，是为了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。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，使我们祖国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，以崭新的面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，是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。不错，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，走过弯路，有过比较大的失误，然而，经过总结经验教训，我们作了改善和调整。可是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，死死抓住我们的一些缺点错误不放，把那些在探索中的失误说成是“假社会主义”，而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光辉成就不屑一顾，胡说我们搞了“三十多年就是搞出一个法西斯专政”，从而得出结论：应该放弃社会主义，全盘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。这种言论，难道也属于“双百”方针的范围，应该受到保护吗？

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吹者，除了把矛头指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外，更多的还是攻击毛泽东文艺思想。他们公开声称：毛泽东文艺思想就是最大的框框，不突破就不能彻底解放思想。首先，在怎样看待“人民”这一点上，他们和毛泽东思想便是完全对立的。毛泽东同志认为，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，在《愚公移山》中，把人民比喻成我们革命事业中的“上帝”，邓小平同志也讲，人民是文艺的母亲，而他们则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超人的英雄，而人民都是自私、愚昧落后的。刘宾雁在讲话中，便公然把搞投机、卖假药的人作为“国民素质低劣”的根据，因此，对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问题上，两种观点是对立的。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应为人民服务，首先为工农兵服务，小平同志也是如此主张，而他们根本反对服务的提法，认为一谈“服务”便贬低了文艺，贬低了作家，把作家变成驯服工具。毛泽东、邓小平都提出讨论文艺问题，不应从定义名词出发，应该从现实革命的总任务出发来讨论文艺的任务，他们则要反其道而行，不谈革命现实的总任务和文艺的时代任务，要“为文艺正名”，主张文艺脱离政治，“回归文艺自身”。由于在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上存在着分歧，一系列分歧便随着发生。从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观点看来，文艺既然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，深入生活，熟悉人民及其火热斗争，当然是首要任务，中心环节，因此毛泽东同志、邓小平同志都一再提出：生活是创作的第一泉源，唯一泉源，此外没有第二个泉源，当然是要求八十年代的作家，也应该象过去熟悉战争土改一样，熟悉今天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沸腾生活；而另外一些人，则认为文艺的最高目标是“表现自我”，作者自己就是中心，自己的生活，本身就是一口永远汲不干的深井，所谓深入生活，只不过是庸人自扰而已。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之下，脱离生活、脱离人民，闭门造事，胡编乱造的风气越演越烈，各种刺激人的感官、追奇逐怪的作品，受到吹捧，真正反映现实的作品，反而受到冷遇；流风所及，作家的眼光越来越窄越小，从茶杯里的风波，到“离不开脐下三寸”，把描写性心理和性交过程的东西也引入文学殿堂。这绝不是社会主义指导下的“双百”方针的贯彻，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。早在1983年，邓小平同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，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，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，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，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，激发他们的热情，坚定他们的信心。相反，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、灰色的、以至胡编乱造、歪曲革命历史和现实的东西。有些人大肆鼓吹所谓“现代派”思潮，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“表现自我”，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、人道主义，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

为创作的主体，个别作品还宣传色情宗教，”这是多么沉痛的批评和呼吁，可惜有些有权有势的人把这些逆耳之言当作耳边风，不仅不改弦易辙，而且沿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斜坡一路滑下去，愈滑愈远，实在是令人痛心的事。

1986年，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泛滥，文艺界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乱。从文艺理论来说，各种“主义”，各种“体系”，纷纷出来争领导权，自封为最科学的真理。有一种理论，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，否定客观生活第一性，否定文艺是人民生活在作家头脑里反映的产物这一科学真理，一棒子把“反映论”打成“客观反映”、“机械反映”，认为只有作家头脑里的东西才是文艺的“内部规律，并由此武断地作出结论：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，“从整体看都是庸俗社会学”。这种论点如果成立，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文艺思想当然就无生存的余地，因此，马克思主义者站出来说话，是理所当然的。然而，这种把矛头直刺马克思主义咽喉的理论，风靡一时，到处是奉迎和喝彩声，而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一篇文章，却遭到百十多篇文章的“围攻”，这倒有些奇怪了。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？我们的文艺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、要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吗？这样怪现象的出现，难道容许继续下去吗？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，都会作出毫不含糊的回答。

直到今年一、二月号的《人民文学》，还以《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》为题，大张旗鼓宣传“文学多元”的主张，鼓吹文学上的“各个元”一律平起平坐，完全平等，你可以在多元中自由选择，转变投向，但绝不能有“卧榻之边不容他人酣睡”的态度，要警惕“血液中的帝王思想”等等。为了表示完全平等博爱，公开提出“那些脱离经济，脱离政治，脱离社会、甚至脱离大多数读者的多少带有追求”唯美“味道的”都一律欢迎。为文坛绘制了一个“共有共荣”图。他们提出的口号，是“在文学面前人人平等”。可惜的是，在这幅图画里，“四项基本原则”没有了影子，两为方向没有了影子，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文艺的指导地位，当然早已撤消，顶多只不过是“各个元”中的“一元”，蹲在你的“一角”地位老老实实，如果你脑子里还有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念头，就是“血液中的帝王思想”！这是哪一家的“双百”方针，不是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吗？

然而，现实是无情的，他们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，把马建的侮辱藏族同胞的小说《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》作为“有个性”的力作，“隆重地”推荐给读者的。而这篇“力作”，正如他们在自我检讨中讲的，是“内容污秽，风格低下”的坏作品，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，象这样的直接违反民族政策、文艺政策、破坏民族团结的作品，在社会主义文学大花园中，是没有它的生存权的，这倒不是“卧榻之边不容他人酣睡”，而是社会主义文学、人民文学信守不渝的原则。正如邓小平同志每次指出的，对于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东西，我们任何时候也没有主张“放过”，这个例子也充分说明一条真理，摆脱党的领导，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，摆脱社会主义轨道的“双百”方针，只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，在中国是行不通的，亿万人民是不会答应的。

综上所述，对于“双百”方针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，一种是：“双百”方针是党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科学、文化的方针，它是有前提条件的，即“四项基本原则”的制约，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；它的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，扩大社会主义的阵地，它象一条十分宽阔的马路，汽车、电车、自行车、行人，各有各的位置，遵循交通秩序前进；另一种是：个人完全自由，绝对自由，你可以自由地往东，我可以自由地往西，你想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，你可以宣传社会主义，我也可以宣传资本主义，以个人兴趣为中心，以个人利益为依归，

(下转71页)

$(A \Rightarrow (A \Rightarrow B)) \Rightarrow (A \Rightarrow B)$

考虑到衍涵(entailment)不仅要求相关性,还要求必然性。因此他们又加进了模态系统 S_4 给严格蕴涵(必然性)所加的特征性限制。 S_4 是:

公理1. $p \rightarrow p$; 2. $L(p \rightarrow q) \rightarrow (Lp \rightarrow Lq)$; 3. $Lp \rightarrow LLp$

规则(R_N)如果 $\vdash A$, 那末 $\vdash LA$ 。

安德孙和贝尔纳普将相关蕴涵系统 R 与模态系统结合起来得到了衍涵系统 E 。 E 中的有关衍涵部分是其关键性的公理(衍涵记作 ' $\approx$ '),

1. $A \approx A$; 2. $A \approx B \approx ((B \approx C) \approx (A \approx C))$; 3. $A \approx B \approx (((A \approx B) \approx C) \approx C)$; 4. $(A \approx (B \approx C)) \approx ((A \approx B) \approx (A \approx C))$

这些系统的主导思想上与制约逻辑仍然存在根本的区别。例如 E 系统承认模态逻辑,“必然”被当作一元模态词,承认蕴涵词,以真值函数为基础,重视“相关性”等,而制约逻辑则不承认模态逻辑,“必然”被看作二元联结关系,不承认制约是任何蕴涵词的变种,不以纯真值函数为根本,重视“独立性”等。看起来,不能把制约逻辑简单地看作那些系统的变种。

整个说来,尽管制约逻辑对数理逻辑的主导思想表现出强烈的“反正统”倾向,然而在另一方面,它又表现出对传统逻辑的继承性和密切的血缘关系。传统逻辑确认假言推理中命题的真假不取决于支命题的真假,从而确保能用诸推理格式进行不循环的论证,并从已知推进到未知。制约逻辑坚持了传统逻辑的这种主导思想,并借数理逻辑的技巧加以表扬。因此,制约逻辑的研究应看作传统形式逻辑研究在现代的继续。

制约逻辑作为一种新的逻辑理论是否成功,有待于时间的考验。它很可能遭受种种反驳,甚至被证伪。即使将来被证伪,它也包含成功的一面,因为提出富于启发力的新问题本身就是对于逻辑进步的一种贡献。

注释:

① 参见桂起权:《什么是逻辑哲学》(载《逻辑与语言学习》1986年第6期)。

② 林邦瑾:《制约逻辑——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结合》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10页。

· (上接75页)

好象一个大集贸市场,但不准有管理人员,这才是彻底的自由,彻底的解放。“春风吹得游人醉,错把中国当美国”大有人在,两种力量正在殊死的决战,这是一场庄严的斗争,因为它关系祖国变不变颜色,关系四化建设的成败,也关系下一代是接班人、同路人、或者是杜勒斯希望的第三代的问题,而这斗争,又是长期的、持久的,贯串我国改革、开放的全过程。但是绝大多数同志都是认识问题,是能够坚持两个“基本点”,因此,摆正“双百”方针和“四项基本原则”的关系的。这对于理论文化战线,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。